

百年来以出土文献研究《诗经》之分野及评述

白军鹏

(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吉林长春 1300012)

“古来新学问起,大都由于新发见”。这是王国维先生 1925 年在清华演讲时提出的。当时正值新材料蜂出,“殷墟甲骨文字、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简、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、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”。由此催生出的甲骨学、简帛学及敦煌学均成为显学。这些新材料的发现大都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之交,距今恰好百年左右。

《诗经》研究与应用是很早的,几乎可以与《诗经》的创作时代相衔接。《左传》中即有很多关于赋诗、论诗的记载。绵延两千多年而不绝。对于《诗经》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全方位的。当然,其中,读懂是最基本的条件,而由于创作时代很早,使得许多地方难以理解。故《诗经》的训诂成为历代研究的主线(包括名物制度),我们耳熟能详的研究著作大都是训诂方面的,有清一代,朴学勃兴,无论毛诗还是三家诗的研究都达到了新的高度。如果继续延续这种研究势头,还需借助于新的方法及材料。季旭昇先生谓“如以文献为范围的考据而言,大概可以做的部分差不多都被清人做完了,后人几乎不能再从文献上做出超越清人的考据成绩”(《诗经古义新证》自序,学苑出版社 2001 年)是很有道理的。

我们这里所说的出土文献的外延较之通常所谓的古文字要大一些,因为它包括了诸如敦煌写本、吐鲁番写本这些并非全发掘于地下的材料,而且这些材料也不属于传统意义上古文字学研究的范围。运用出土文献研究《诗经》最早始自宋人,朱熹在《诗集传》中对《大雅·行苇》一篇中“以祈黄耆”、“以介景福”进行解释时,就曾经引用金文,“以祈黄耆,犹曰以介眉寿云耳。古器物款识云‘用斡万寿’、‘用斡眉寿’、‘用命多福’、‘用斡眉寿’、‘万年无疆’,皆此类也”。到了清代,马瑞辰等人在研究毛诗时也曾援引金文证诗。朱、马等人之所以能做到用金文证诗,与其所处时代是密不可分的,宋代是金石学的开创时代,上至天子,下至公卿文人皆受此影响。出现了一批金石方面的著作,如吕大临的《考古图》、王俅的《啸堂集古录》、薛尚功的《历代钟鼎彝器款识》等。朱熹本人亦曾说“予少好金石文字,家贫不能多致,独时取欧阳公所集录,观其序跋辩证以为乐(引者按,即《集古录跋尾》),后又得赵氏《金石录》读之,大约亦如欧阳子书,然序次益条理,辨证益精博,予心亦益好之。”而清代更是金石研究的盛世,不仅著作非常多,而且研究水平也更高。

然而这种情况在当时还是凤毛麟角,而且也并非有目的、有系统地进行。真正用出土文献研究《诗经》,还是要从 20 世纪古文字学蓬勃发展以后才开始的。到现在为止,我们觉得这种研究已经可以成为一门学问,因此,对这一门类进行划分是可以做到的,而且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,也是必须要做的。

我们将这种新的研究分为下面几个方面加以介绍。

一、诗义的新证

这方面的作品,早期有于省吾先生的《泽螺居诗经新证》(此书虽然出版于1982年,但是全书的主体实作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)、林义光的《诗经通解》(1930年衣好轩本),还有闻一多发表于《清华学报》第十二卷第一期的《诗经新义》以及尚未完稿的《诗经通义》,后来三联书店出版《闻一多全集》时将二者整理,载于第二卷《古典新义》中(在下面,提到关于诗义新证的研究我们都称之为新证或新证派)。但是严格的说,这几位先生的研究都并非将其“新”全部注于新材料中,很多情况下还是单纯运用传统的训诂学来解诗。他们三位中,以于先生最具有主动运用出土文献证诗的精神,可以说,在这一点上他的成就也是最大的。在这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《诗经》新证类的著作问世,最近的是季旭昇先生的《诗经古义新证》。此书分上、中、下三编,上编为字句训诂,中编为名物制度,下编为篇章通解。季先生作为古文字学家,在考证的过程中充分运用了新发现的古文字材料,主要是以古文字学者的研究成果证诗,取得了较好的成绩。但是此书也有其缺点,即有时说解并未切中要害,有时引用了很多材料,但是结果却并不明确。如上编“《会朝清明》古义新证”条,在考证“会朝”一义时,季氏全引“利簋”铭文,并为释读(释读占了整篇文章的大部分),但是只是在“克闻夙有商”句下同意唐兰先生的意见“一个早上就打败了商朝”。在结尾处得出“因此‘会朝’之解,似以‘一个早上’为好”。唐兰先生的观点是否正确尚可以讨论,因“克闻夙有商”一句的解释推论“会朝”的意思,实在是有些武断。而且按季氏所言,这种观点最早明确提出的是清人惠栋,而惠氏所云甲朝乃一朝的观点实际上是推阐毛传之说。毛云“会,甲也。不崇朝而天下清明。”惠氏认为,古皆以甲为一,则其意“会朝清明”即“甲朝清明”,即“一朝清明”。“甲”与“一”义相承确是事实,然而这种以“甲朝”为“一朝”的情况,古书中并无他例。惠氏所言不足为据。而在关于“清明”的解释中,季氏谓郑不如毛——“不崇朝而天下清明”。后又举林义光、于省吾的“晴明”说和袁宝泉、陈智贤的“盟明”说,谓“以上二说都持之有故,虽然未能言之成理”。可见,季先生虽然引用了很多材料和观点,但是对结论似乎并无太大帮助。实际上,正如于省吾先生言“林义光解‘会朝清明’为‘适会早晨清明之时’是对的”(见于前引于氏书)。清明之义不宜求之过深,而会的“适会”之义文献中亦不乏其例。当然,瑕不掩瑜,季先生在诗义新证已沉寂数十年后踵于前贤,其功自不可没。

出版于2000年的扬之水《诗经名物新证》(北京古籍出版社)亦属此类,全书以30余万字的篇幅讲解了16首诗,对每首诗的说解十分详尽。但是此书也有明显的缺点,即有时在说解上略显繁冗拖沓,因为经过历代学者的研究,虽然《诗经》中的名物还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,但是毕竟大部分是可以明了的,所以如果作为学术性的著作,本应就难论难,但是此书很多时候更像是《诗》的全篇讲解,让人很难抓住其中的妙处。

有些《诗经》注释的著作中也偶有以出土文献证诗的部分,如高亨的《诗经今注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),作者是王国维的弟子,研究方法自然受到乃师影响。如解《周颂·维清》之“肇禋”为“肇西土”即一例。除此之外,也还有单篇文章运用新证派方法对《诗经》语句进行解说的,然而似乎大都没有取得学术界的认可,故而影响也不大。

二、异文研究

所谓异文研究就是主要针对考古发现的含有《诗经》的材料与今本《诗经》进行对比校勘等的研究。这种材料包括《诗》的原本,也包括其他文献引《诗》的部分。值得指出的是新证派的研究有时也是以《诗》的异文为研究范围的,如于省吾先生在《泽螺居诗经新证》中有时列诗经中的某句后只举金文中的某一两个类似句,并不多进行说解,其用意自然是引导读者对两者进行比对。如上卷“帝作邦作对”下,只举孟鼎“在王嗣王作邦”,此类例子很多。但是在早期,真正大宗的异文材料几乎是没的,各家研究运用的出土文献主要是甲骨、金文、当时所发现的汉石经鲁诗以及极少部分的敦煌写本,而且很多结论的得出并非源于比勘异文,所以我们将新证的研究和异文研究分为两类。

根据葛立斌《二十世纪〈诗经〉出土文献述评》(《湖北师范学院学报》2008年第2期)的统计,20世纪含有《诗经》的出土文献有13次发现。我们先将葛先生所列的13次置于下面,以便观览。

1. 敦煌卷子《诗经》本。
2. 吐鲁番《毛诗》残卷。
3. 甘肃武威汉简所论《诗经》
4. 汉魏洛阳古城太学遗址新出土的汉石经残石。
5. 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《晏子春秋》中引《诗》一句。
6. 河北定县汉墓竹简《论语》所论《诗经》。
7. 汉马王堆帛书五行中引《诗》。
8. 安徽阜阳竹简《诗经》。
9. 河北平山县出土“平山三器”铭文的引《诗》。
10. 汉鲁诗镜。
11. 郭店一号楚墓的《郭店》竹简。
12. 江苏连云港尹湾汉墓《神乌赋》所引诗。
13. 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竹简《孔子诗论》。

关于葛文所列的这13项,我们需要稍加补充说明,第8项所谓“汉鲁诗镜”。此镜于1978年发现于湖北武汉,随后罗福颐先生撰文《汉鲁诗镜考释》(《文物》1980年第6期),将其定为鲁诗,但是对于这一镜铭诗的学派归属,目前尚有争论,如胡平生、韩自强合著的《阜阳汉简诗经研究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8年)便以为罗说“似嫌证据不足”。而陆锡兴先生则认为其当属毛诗(《〈诗经〉异文研究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01年)。虽然我个人倾向于此镜铭应为鲁诗,但是在各家意见尚未统一时,我们觉得还是称其为“《硕人》镜铭诗”为当。

第13项,葛文只言《孔子诗论》,实际上将《上博简》一中《缁衣》引诗漏掉了。

在金文中,除平山三器外,尚有一些引诗的铜器铭文,如李学勤先生在《史惠鼎与史学渊源》(《文博》1985年第6期)中所讨论的“日就月将”一句,便是引自《诗·周颂·敬之》篇。当然,青铜器铭文引诗比较零碎,不易一一在提纲中列举。

此外,汉魏时期所刻碑文中亦有丰富的引诗。虽然这些碑文一直立于地上,人人得而研读,但是正如青铜器铭文很早就发现了,但是真正对其中引诗(也包括引用其他经)进行有意识的研究则已经是很晚的事了,而且这些碑文和地下出土文献有一个共通点,就是没有经过后世学者篡改。所以,在研究《诗经》异文上,这些材料必须参考。

那么,关于出土文献《诗经》异文研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?

可以说,每次新发现的整理者就是最初的出土文献引《诗》异文的研究者。我们再举史惠鼎的例子,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言“日以下字,简报云即‘日就月将’”,可见,最初的整理者已经确定其为《诗经》中的句子,只是“未作分析说明”罢了。

这方面研究可追溯至敦煌写本《诗经》的早期研究者们,首先可举出刘师培,1911年,他发表了《敦煌新出唐写本提要》(收入《刘申叔遗书》,凤凰出版社),其中对P.2529和P.2538两件写卷做了校勘性的提要。前引胡平生、韩自强的《阜阳汉简诗经研究》对阜阳简《诗经》进行了深入而比较广泛的研究,此书出版后,很少见有对阜阳简《诗经》进行研究的文章,可见此书的成绩是很大的,正可谓剩义无余。只是此书偶有误字漏字,我们已经作了补苴。

运用出土文献对《诗经》进行综合整理的,大陆地区有三家,即陆锡兴《〈诗经〉异文研究》、于蒹《金石简帛〈诗经〉研究》(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4年)和程燕《〈诗经〉异文辑考》(安徽大学出版社,2010年)。三书中,陆书最早,但是作者以研究传统语言文字见长,其学术视野并未及于古文字,故虽然其书2001年出版时《郭店简》和《上博简一》已出,但该书并未谈及,不过,据作者云此书是集考、论于一的,所谓考即文字的比对,即罗列异文,比勘校对;论则涉及到学术论说、学派属性及文字理论等。书中确实有论有考,论在每章开始,考则置于其后,这确实是后二书所没有的。

于书出版于2004年,其书中将《郭店简》及《上博简》中引用《诗经》的地方悉数收入。但因为此书的范围是“金石简帛”,故敦煌文献并未收入。是书分上下两篇,上篇题为“金石简帛与四家诗异文汇考”,下篇为“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诗论考释”。此书引用古文字材料也不全,如前面提到的史惠鼎中引《敬之》篇的“日就月将”,便没有引用。

程书成于最后,引用的材料最为丰富,超过了前两家。此书并没有类似于陆书的“论”,但是在涉及到的相关问题,也有理论上的总结。

前面我们提到了汉魏碑文引《诗》,在汉碑方面,最著名的要数皮锡瑞的《汉碑引经考》(此书没有单行本,收入皮氏《师伏堂丛书》中)。此书收罗汉、北魏碑刻引《诗》材料,在《诗》的异文研究中便于参考。

值得指出的是,最近几年,对敦煌文献和汉魏碑刻文献的整理取得了一些成果,出版了集成性质的论著。如毛远明的《汉魏六朝碑刻校注》(线装书局,2006年),以及张涌泉主编的《敦煌经部文献合集》(中华书局,2008年),无疑对于《诗经》异文研究是有帮助的。

在异文研究中,除了将之与今本毛诗比勘外,一个重要的价值就是所谓“三家诗”的研究。如前所说的“镜铭诗”各家对其所属学派进行讨论一样,阜阳汉简的整理者也对其学派属性进行了研究,通过对比,他们得出的结论是“《阜诗》与《毛诗》有如此之多的异文,其非《毛诗》系统可以断定……根据以上材料,我们可以认为《阜诗》大概不会属于鲁、齐、韩三家中的任何一家”。如果单纯从文字的对比来看,《阜诗》整理者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。但是,问题是单单对

异文进行对比是否便能得出可靠的结论?众所周知,三家诗异文整理,陈寿祺、陈乔枏父子的成就最大,而王先谦则最后作了总结,其方法是首先确定汉人的学派属性,然后将其著作中引诗之处提出。事实上,对于学者学派的判定,有时只是出于推测,如楚元王刘交习鲁诗,而刘向为元王子休侯刘富曾孙,故推定刘向父子应习鲁诗,又因张衡《东京赋》“改奢即简,制美斯干”与《刘向传》说诗义合,又定张衡习鲁诗。而支持他们诸如此类推定的便是“汉儒最重家法”。汉儒重家法是事实,但是重视到什么程度,并没有直接的证据。而据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载,张衡曾作《周官训诂》。如果按照陈、王之说,作为习今文家鲁诗的张衡,是不应该为古文经《周官》作训诂的,可见所谓的守家法,并不绝对。而在《诗三家义集疏》中,常有三家诗之“又作”。如今本毛诗《小雅·小旻》“滄滄訖訖”,《尔雅·释训》作“翕翕訖訖”(据王先谦言,汉儒谓传《尔雅》者叔孙通,而通为鲁人,又郭璞《尔雅注》所言屡与鲁诗合),而据《汉书》所载刘向《封事》引此则作“歎歎訖訖”。荀子一向被认为是鲁诗所从出,而在《荀子·修身篇》中此句则作“噏噏皆皆”。虽然王先谦大力弥缝异说,但是却难以让人信服。

上面的这种不同的发生,也可能是缘自历代流传。从最初的手抄到后来的雕版,一次次的流传,让古书面貌大改。这从出土古文献与今本的对比很中便可以看出。我们曾经对比《荀子》各版本之异同,证明《荀子》在流传过程中有的版本中引诗时时明显有被改以毛诗的痕迹。但是不管怎么样,单纯依据字的同异来判定某属哪派,或不属哪派,都是危险的。

三、时代的讨论

《诗经》各篇的时代,据毛、郑之说,很多篇是可以确定时代的,但是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毛、郑的附会成分很多,有些是不足为据的。如果能够依据出土文献来确定《诗经》一些篇章的时代,则是很有意义的,也将是比较可信的。但在这一问题上,目前为止尚无人进行综合的研究,下文分成两部分来讨论:

(一)对《商颂》时代的考辨。《商颂》时代的纷争由来已久,简单的说即古文家尊毛说,以为《商颂》是实实在在的商代作品,今文家则据三家之说定为春秋时宋人所作。甲骨文被发现后,王国维曾作《说商颂》(收入《观堂集林》,中华书局),发展前人的宋诗说,并以甲骨文为据,证明《商颂》确实是宋诗。因其论据新颖,此后信从者渐多。虽然有一些学者出来反驳,但显然并未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同。

但是,最近,据我们考查,有几位学者援引古文字材料(主要是甲骨文)进行了新的研究,得出了与王氏相反的结论。其中廖群的《先秦两汉文学考古研究》(学习出版社),其第二章“文学考古与《诗经》研究”的第一节为考古发现与《商颂》研究,列举了“商诗说”的考古十证。陈伟湛先生的《商代甲骨文金文词汇与〈商颂〉比较研究》(《中山大学学报》2002年第1期,又收入氏著《甲骨文论集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3年)以《商颂》中所见的单字大多见于甲骨文及商代金文,故而推论《商颂》应该是商代的作品。徐宝贵先生的《出土文献资料与诗经学的三个问题考论》(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》第2辑)则以甲骨文中所见的“学商”“奏商”及“舞商”来证明《商颂》为商诗。又有江林昌先生推阐毛传之说,认为《商颂》中的《那》和《烈祖》乃成汤祭祀殷先公之诗。而其最重要的论据便是这两首诗中的“汤孙”实即“孙汤”(《〈商颂〉的

作者、作期及其性质》,收入《追寻中华古代文明的踪迹——李学勤先生学术活动五十年纪念文集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)。江氏又作《史墙盘与〈商颂〉》(载《华学》第8辑,紫禁城出版社),将史墙盘之“五十容处”之“容”与《商颂》之“颂”相比附,进而推论《商颂》确应是商代作品。最近,他又作《甲骨文与〈商颂〉》(《福州大学学报》2010年第1期)进一步申其前说,然而文中基本上仍是沿着前人思路,并未提出新的证据。此外,尚有一些学者从历史、诗义的角度考证《商颂》时代,但既提不出新的证据,也没有以新的方法来论证,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。

前引这些文章的论据或论证过程都存在着不同的缺陷,限于篇幅,本文难以赘述。通过研究,我们认为《商颂》中的《那》、《烈祖》和《玄鸟》应该如王国维所说的,是西周中期(或是晚期)的作品,而《长发》和《烈祖》则很有可能是东周时期的作品。

(二)其他各篇时代的研究。首先运用古文字材料来论证《诗经》其他篇时代的也是王国维。在《采薇》、《出车》、《杕杜》、《六月》几篇的创作时代上,大体说来,诗序以为《采薇》、《出车》、《杕杜》为文王时诗。班固则以为《采薇》作于懿王时,《六月》、《出车》作于宣王时。后世学者,古文家多信从诗序之说(可见胡承珙《毛诗后笺》,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求是堂刊本;马瑞辰《毛诗传笺通释》,续修四库全书影印道光十五年马氏学古堂刻本),今文家则以诗序为谬说(见王先谦《诗三家义集疏》,中华书局)。王氏在《鬼方昆夷獫狁考》一文中说“今焦山所藏(引者按,此器原藏镇江焦山定慧寺,现藏镇江市博物馆)鄮惠鼎云‘司徒南中,入右鄮惠’。其器称‘九月既望甲戌’,有月日而无年,无由知其为何时之器,然其文字不类周初,而与召伯虎敦(按,即琯生簋)相似,则南仲自是宣王时人。《出车》亦宣王时诗也。征之古器,则凡纪獫狁事者,亦皆宣王时器。”廖群先生结合新出青铜器对王氏之说又进行了阐发。得出结论“这样,铭文与诗文互相参证,基本可以确定,伐獫狁确为宣王时事,那么,《小雅·采薇》、《出车》和《杕杜》这一组诗就都是反映宣王时抵御獫狁进犯的作品了”(见前引廖氏书)。我们在二氏的基础上对这几首诗又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,证明《出车》篇确实作于宣王时期,又根据系联,得出其他几篇也应是同时期的作品。此外我们还对“吉甫”,“师兑、皇父、禹、番生”等两个(组)人物进行研究。确定了《六月》和《十月之交》的时代。

在此本文想提出一个老概念(或者说是一种方法)——系联法,但与以前的并不完全相同。我们的方法是人物系联与诗篇系联,由出土文献中的人物与《诗经》中的同名人物相系联,再由诗的内容系联出相关其他诗。在对《出车》等篇的考证中,我们就运用了这种方法。但是这种方法是有限性的。首先,古人同名者是很多的。比如同样名为“利”的就有周初时的“右史利”和恭王时的“利”,而他们绝无可能是同一个人。所以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很难坐实《诗经》中的某个人便是金文中的某个人。因此我们在进行确定的时候都尽量用传世文献为辅,如《诗经》中提到的征伐獫狁的“南仲”与金文中“见淮夷”(驹父尊)的南仲便很可能是一个人。其次,用来断代的青铜器,事实上很多还有争议,在具体利用的时候只能以一种说法为凭据,但是有可能这个判断是错误的;对于诗篇之间的系联,有时也存在着将不同时代同类型的诗归入同时的危险。但是,这毕竟是一种能最精确确定《诗经》时代的方法,有待学者加以完善。

陈致在《周颂与金文中成语的运用来看古歌诗之用韵及四言诗体的形成》(收入《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诠释——纪念谭普森先生逝世两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》,又收入其主编的《跨

学科视野下的《诗经》研究》,均在201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)中,结合金文和《周颂》中的“成语”及用韵情况讨论了其中一些篇的作成时间。认为“传统的观点认为《诗·周颂》各篇都成诗于武、成、康、昭时期是不能成立的。《诗·周颂》中有些语词如我们在本文中所讨论的,从金文来看,在穆王时期以前并未出现,而许多篇诗歌的行文、用韵、成词的使用都与西周晚期的金文惊人地相似,这说明这些诗篇更有可能是西周晚期的作品”。曹建国在其博士论文《出土文献与先秦诗学研究》(2010年3月此文由武汉大学出版社以《楚简与先秦诗学研究》为名出版,据作者云,书的第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七章基本上保持博士论文原貌,其他几章则是毕业后所写。另外,因此书属于陈伟先生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“楚简综合整理与研究”成果之一种,限于题材,原论文中有关金文的部分已经删去)的第二章《金文赅词与〈诗〉篇断代》则主要依据所谓的“赅词”出现时间来断限一些诗篇的时代。如通过对含有“祈求寿考”类赅词的一些《诗篇》进行考查,得出“《七月》作于西周中期以后”的结论。

四、《上博简·孔子诗论》对“诗学”研究的新推进

《上博简·孔子诗论》(以下简称《诗论》)发表后,学者们纷纷进行研究。在分析《诗论》的同时,也都援此以证《诗》。《诗论》中引《诗》及诗名很多,即从纯粹的文献意义上来说,亦有很多可资考证之处,故在新证与异文研究上的价值亦是很大。但是,更重要的价值则体现在对孔门诗学以至整个先秦诗学、诗传以及“孔子删诗”的研究上。

(一)《诗论》与《诗序》的关系。《诗论》的附录二,是《孔子诗义与毛诗小序评语对照表》,可见整理者马承源等是有意将《诗论》和《诗序》相联系的。顺此思路,很多学者对《诗论》与《诗序》的关系展开了讨论。认为二者有联系者,如江林昌谓“竹简《诗论》可能是《毛诗》序的祖本”(《上博竹简〈诗论〉的作者及其与今传本〈毛诗序〉的关系》,收入《上博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)。又如饶宗颐先生曾撰文《竹书〈诗序〉小笺》(同上),是径称其为《诗序》。反对者如彭林先生在《“诗序”、“诗论”辨》(同上)中曾指出“诗序”和“诗论”的不同之处,即“诗序”以介绍背景材料为主,不引正文,各篇之序各自为文,不旁涉它篇。而“诗论”的重心则是论述《诗》的思想内涵,着重在《诗》的本身。“因此,断断不能将《孔子诗论》名之为‘《诗》序’,或者‘古《诗》序’”。应该说《诗论》和《诗序》有无关系对于《诗经》的研究有很大的意义,众所周知,关于《诗序》的作者,两千年来一直有不同的说法,至今不能统一。如果《诗论》确是《毛诗》序的祖本,那么《诗序》的作成时代便不可能太早,至少不能早至子夏,因为从《诗论》上看,正如马承源先生说的那样,《诗论》“没有发现如《毛诗》小序所言那样许多‘刺’、‘美’对象的实有其人”。因此断言《毛诗》小序“可能相当部分是汉儒的臆测。”

(二)孔子删诗的问题。这个问题最早由太史公在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中提出,孔颖达在《诗经正义》中提出怀疑,两说论争千余年(也有学者如朱金发认为郑众已经开始反对孔子删诗之说,见其《孔子删诗说讨论综述》,载《南阳师范学院学报》2007年第1期,若如此,则此论争近两千年)。“上博简”公布后有学者借助其中《孔子诗论》、《采风曲目》及《逸诗》等篇对“孔子删诗”说进行重新研究。如前面提到的徐宝贵先生的文章第二节便统计传世文献及出土文献(主要是“上博简”)中相关逸诗135篇,并谓“没有将有歌辞无篇名的逸诗计算在内”,

其结论是“‘孔子删诗’不十分准确”,显然至少是认为古诗若不经删减“数量会更多”。刘立志《出土文献与〈诗经〉学研究二题》(《北方论丛》2005年第3期)甚至据此认为“孔子删诗”说是可信的。应该说关于“孔子删诗”说这一疑案远非“上博简”这几篇能解决,但是这说明出土文献对“孔子删诗”问题的解决是有很大帮助的。

除此之外,如曹建国所指出的“《诗论》与孔子诗学思想的阐释”以及“《诗论》与孔门《诗》传”等,也都很具有研究的价值和空间。

五、其他

除了以上所列四项之外,在运用出土文献研究《诗经》的问题上还有一些方面是值得研究的,如《诗经》文本的形成和构成等。

如陈致在《〈从礼仪化到世俗化〉——〈诗经〉的形成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9年)一书中,就尝试用古文字的材料探讨颂、雅、南及风的原始意义,提出了“‘南’字字义本为初生之竹,字形又像竹节,最初为竹木制的容器和打击乐器,后来又为南方乐钟的代称,进而代表具有南方色彩的音乐体式,‘风’最初为普通管弦乐器的代称,后来成为具有地方色彩的音乐的代称;‘颂’源自商代的乐钟‘庸’,是殷商贵族用于祭祀、飨宴以至军旅所用之器。……而‘雅’即‘夏’,是周人在与其宗主国‘大邑商’相对抗的过程中营造出来的文化概念”。虽然其中的一些观点并非作者首次提出,如张西堂在《诗经六论》(商务印书馆,1957年)中已经指出颂即镛,但是作者经过坚实的出土文献的证据,证明了颂实即作为大钟的庸。这样的论证,无疑是很有意义的。

以上是我们对百年来用出土文献研究《诗经》所进行的分野及评述,以便将《诗经》研究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层次。

近百年来秦汉地方行政制度研究综述

刘晓满

(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 北京 102488)

秦汉确定了中国封建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度,而以郡县制为主要表现形态的地方行政体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,成为君主统御地方、强化全国统治的有力手段,为以后历代王朝所承袭。地方行政制度是秦汉史研究中的重要领域,涉及地方行政机构的组织、运作,吏员设置、升迁、秩次等诸多问题,一直倍受学者关注,近百年来前人有关的研究已取得了丰硕成果。